

超越民族矛盾与国民情怀

——《现代》杂志的弱小民族文学译介^①

刘叙一 李映瑾

(1.上海商学院 2.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摘要:“淞沪抗战”后于上海创立的首份“非同人”性质的大型文学杂志《现代》对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有别于当时我国弱小民族文学翻译的整体风潮。由此,《现代》杂志进一步传达了特殊的翻译语境下对国别文学进行选译时不以国家的大小强弱为标准,而是以文学价值为主要标准的翻译倾向。其翻译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一直以来被强化和凸显的民族矛盾和国民情怀的书写,缩小了所谓“强势”与“弱势”的概念差异,将这原本在文学层面上不为人所重视的对象纳入了主体探讨的空间,更为全面地揭示了这些国家及民族文学的本质属性及审美特征。

Abstract: As the first non-coterie magazine established in Shanghai in the 1930s,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weak and small nations conducted by *Les Contemporains* we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trend at that time in China. Accordingly, *Les Contemporains* has delivered a translation trend focusing on literary values whether the nation is a great power or not in special translation context. The translations have transcended the portrait of national conflicts and feelings which have always been highlighted, narrow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rong and the week and putting them into the mainstream discussion space of literature,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nature and aesthetic features of these nations.

关键词:《现代》杂志;弱小民族文学;翻译;文学性

Key Words: *Les Contemporains*; literature of the weak and small nations; translation; literariness

一、引言

“现代文学的塑造和构建始于报刊和书局,报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李楠,2007:47)《现代》杂志(*Les Contemporains*, 1932—1935)便是这样一份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刊物。《现代》是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仅有的几份大型文艺杂志之一,也是当时上海第一份“非同人”性质的文学期刊,杂志在主编施蛰存的主导下组织并开展了各类文学翻译活动。在编者以文学价值为先、包容开放的编辑方针和先锋性选载眼光的指导下,《现代》的翻译活动呈现了丰富

多元而又有所专注的文化生产空间,“展示了一些现代主义写作技巧,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文学生态”(赵倩倩,18)。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杂志不仅选择了当时被视为主流欧洲文学之外的美国文学进行翻译,还选译了一直以来在国人眼中表达“反抗”的弱小民族文学,“全面、客观而又重点地呈现了世界各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刘叙一、史婷婷,84)。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学生产空间中,《现代》杂志对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活动是对当时盛行的左翼文学及“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补充,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叙述空间,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的资源得到更加完整、多面的体现。

^① 本文系2021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基金项目“产出导向法视阈下商务英语专业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能力培养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C2021335)研究成果。

二、以期刊为主导的“弱小民族文学”译介

关于“弱小民族文学”这个概念,宋炳辉在其研究中是这样来定义的“汉语文化中‘弱小民族文学’的所指,既是相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的世界地位和民族处境而言,同时在中外关系中又是相对于中国与西方强势国家的关系而言的。”(宋炳辉,18)在中国同被视为弱势民族的时期,20世纪初主要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便有意地加强了与中国国情相似的域外被压迫民族文学的翻译,还率先开辟了“被损害的民族文学号”专栏。对这些国家及民族文学的翻译活动反映了“中国作家带有民族心理创伤的世界图像和与跟世界文化霸权的斗争又联结在一起”(陈建华,241)的状态。由此可见,当时以《小说月报》为代表的期刊媒介是带着一种针砭时弊、启蒙改良文学版图的动机开展的翻译活动。据宋炳辉统计,到20世纪20年代末,弱小民族文学翻译已初具规模,多个民族、多位作家的多部代表作得到了翻译及评述,这在中国当时的文学和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宋炳辉,22)到了20世纪30年代,对“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更为盛行,以左翼期刊为代表的出版机构相继推出翻译专号,其重点依旧是延续20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的翻译倾向,即呈现国民情怀,凸显民族矛盾。《文学》杂志首先推出“弱小民族专号”,选译了包括波兰、爱沙尼亚等民族在内的数十部作品;为多个杂志撰稿的赵景深、孙用等也翻译了众多弱小民族小说,并参与了相关译作集的编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由黎烈文等选译的《弱小民族小说选》(1936);以译介世界各国文学为宗旨的《译文》杂志也不甘落后,适时地推出了“西班牙文学专号”(1937)。由此,以左翼期刊为主导的翻译活动将弱小民族文学在我国的译介推向了高峰。

虽然“弱小民族文学”从20世纪初开始经由大量的翻译活动为国人所知,多数的译介活动从兴起到倡导,其翻译动机还是延续“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思路——凸显文学所承载的社会功能。编译者们通常从以下几类动机出发进行翻译或组织翻译活动:有相当一部分译者是通过展示弱小民族被欺压的状况来反观中国类似的现实情况;也有译者借助弱小民族文学作品向国人展示弱国沦陷、丧失主权的悲惨境遇,以“警醒”国人;或是通过揭示、剖析弱小民族遭受压迫的原因或经历来刺激国人进行反抗和斗争;以及通过对弱小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描述来探寻可供我国借鉴的、适合我国自强的道路。带着这

些翻译动机,译者们在翻译过程中会表达出对这些国家国民性本质的思考,或是通过翻译的路径来委婉地传达自身所认同的意识形态,以期对社会现实做出某种呼应。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作品中的审美特征,而是基于“人种、因被损坏而起的特别性以及所处的特别环境”(沈雁冰,1921:10)来归纳文学属性与特征。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郑振铎在选择一些小国文学作品时,会特意将这些作品囊括到被压迫、被损害民族文学的类别,通过翻译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来达到与国内现实相呼应的目的。在《小说月报》“弱小民族文学专号”的序言中,编者提及其翻译动机时特意强调并放大了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民族性“一民族的文学是他民族性的表现……要了解一民族之真正的内在的精神,从他的文学作品里就看得出来。”(同上)当提及作品与现实的呼应关系时,编者还说道“凡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的正义真的公道……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灵魂感动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同上)不久之后,《小说月报》更是进一步阐发了开展弱小民族文学翻译的动机“鉴于世界上许多被损害的民族,如犹太如波兰如捷克,虽曾失却政治上的独立,然而一个个都有不朽的人的艺术,使我敢确信中华民族哪怕将来到了财政破产强国共管的厄境,也一定要有,而且必有不朽的人的艺术!”(沈雁冰,1921:106)由此,这些民族文学作品在翻译或传播过程中便被贴上了“被损害”“被压迫”等标签。以翻译世界各国文学为宗旨的《译文》杂志,其“整个30年代的译介风尚仍然继续了前10年翻译弱小民族文学的势头”(崔峰,86)。对这些翻译活动的提倡者来说,原作表现手法和创作技巧的呈现是其次,民族性、思想性的传递才是重中之重。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作品在当时也普遍被视为一种积极进步的行为,正如郭延礼所言,“注意翻译东欧和北欧‘弱小民族’国家中的作品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郭延礼,438—439)。在《现代》创刊的1932年,《北斗》编辑部发起了“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征文讨论。鲁迅在讨论中建议大家“看外国的短篇小说不要光看东欧及北欧作品,也要看日本作品和外国批评家的评论”(鲁迅,2004:310)。当时身为“左联”成员的《现代》核心译者戴望舒也参与了这次讨论。鲁迅的呼吁其实更加证实了“左联”翻译东欧、北欧等民族文学的单一初衷。在此种翻译语境下,译者便不可避免地会忽略该类别文学在创作技法或艺术性上是否值得我国文学创作者借鉴的思考。

从期刊作为译介及传播媒介的视角来看,我国

对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始于 20 世纪初的《小说月报》在二三十年代经由《现代》《文学》《矛盾》《译文》等杂志在我国得到进一步传播,“弱小民族”的文学面貌在国内读者眼中也逐渐丰满。在此过程中,《现代》杂志所开展的具有独特倾向的弱小民族文学译介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现代》的弱小民族文学译介倾向

从“翻译操控”的视角来看,“赞助人”因素极大地影响着翻译活动的组织和开展。^①《现代》杂志的出版方给予了施蛰存编辑时较高的自由度,因此,作为编者的施蛰存完全可以按照其所设定的“不谈文艺的政治作用”“发挥文艺感染读者的作用”等文学主张来组织开展翻译活动。正如杂志的“创刊宣言”所提到的那样,“本刊所载文章只依照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即文学作品本身价值方面”(编者 2)。从翻译动机来说,《现代》旨在通过翻译活动为国内文坛引介全新的创作模式,提供先锋创作技巧的借鉴,以此推动国内文坛对现代主义创作特征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杂志的这种倾向突出体现在其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活动中。从这个层面来说,对该类文学的译介是《现代》杂志彰显其对文学作品本身价值的追求、对盛行意识形态下单一译介倾向的超越以及对先锋性审美体系建构的重要渠道。

于编者施蛰存来说,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注同样来源于《现代》杂志创刊前众多的翻译活动。首先是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影响,《小说月报》“弱小民族文学专号”的推出和《现代小说译丛》的出版。从译介范围来看,光是《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在选材上便涉及了“欧美四十七家著作,国别计十有四,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鲁迅、周作人,1987: 1)。与《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在选译国家倾向上类似的还有《域外小说集》,该文集以选译俄国、波兰等东北欧的作家作品为主,所选译的作品“以唤起民族意识和反侵略的斗争精神,追求达到‘异域艺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的文化‘移植’”“以重铸民族灵魂、重建民族主体性为指归”(李贞玉,139)。这些小说为青年时期的施蛰存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各民族文学的窗口,尤其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带给他极大

的震撼。施蛰存曾说“最先使我对欧洲诸小国文学发生兴趣的是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其次是《小说月报》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和周作人的《现代小说译丛》这些小说大都篇幅极短,而又强烈地表现着人生各方面的悲哀情绪。这些小说给我的感动,比任何一个大国的小说所给我的更大。”(施蛰存,1)。施蛰存的这段回忆体现了其在欣赏此类作品时的特殊视角。很明显,这些作品在施蛰存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象来源于它们作为文学作品在表现方式和创作技法上带给他的震撼和感动。其实早在《新文艺》时期,施蛰存等人便开始关注并翻译阿根廷文学、葡萄牙文学和希腊文学。哪怕是在《现代》终刊后,施蛰存还是持续关注弱小民族文学“钟情于文本表现的深刻的人性和婉转的情致”“且他这种翻译选择的标准,一直贯串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翻译活动中”(刘军,86)。施蛰存的创作也在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Arthur Schnitzler)的影响下,“偏于心理分析”“力图从人的内在生命来表现人性和情爱”(李楠,2008: 118)。经笔者统计,《现代》杂志一共译介了 9 个在当时被称为“弱小民族”的共 45 篇文学作品,文类涉及诗歌、小说、散文、随笔、访谈等(见表 1 所示)。从选译范围看,《现代》所选译的国家、作家数量及文类丰富程度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从翻译动机来看,《现代》杂志关注到了这些作品中的现代性元素和风格,欲挖掘其对现代创作技法的运用,将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率先或重新介绍给国内读者。

表 1 《现代》杂志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统计

国别	作家	数量
西班牙	阿耶拉(Ramón Pérez de Ayala) 阿索林(José Martínez Ruiz) 巴罗哈(Pío Baroja)	17
意大利	彭丹·贝里(英文译名不详) 马里奥(Mario Parz) 莫莱蒂(Marino Moretti Pirandello, L.) 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13
爱尔兰	夏芝(William Butler Yeats)	7
匈牙利	莫尔那(Franz Molnar)	2
爱沙尼亚	Litoratura Mondo(中文译名不详) August Gailit(中文译名不详)	2
朝鲜	郑学哲(英文译名不详)	1

① 勒菲弗尔提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认为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怎样的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译者的意识形态和在译语语境中占支配地位的“诗学”。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直接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而这种意识形态有些是译者本身所认同的,也有“赞助人”强加于他的。而包括个人、组织、阶级、出版社、传播机构等在内的足以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书写或改写的力量即是“赞助人”,以上所提到的三要素是操控文学翻译的主要力量。

续 表

国 别	作 家	数 量
罗马尼亚	勃拉太斯古(英文译名不详)	1
奥地利	显尼志勒(Arthur Schnitzler)	1
比利时	莫里斯(Maurice Des Ombiaux)	1

四、《现代》的弱小民族文学译介动机

仔细考察这些译作,我们会发现《现代》对这些作家作品的翻译其实与20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我国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整体风潮并不一致,在翻译范式与主题上更是有着显著差异。正如从创新、自由、独立等全新的视角看待美国现代文学一样,《现代》没有从“弱小”这个固定的视角去看待这些作家作品。杂志编译群在选译弱小民族文学过程中所呈现的系统的译介模式,对新型文体的探索和对原作创作技巧的聚焦呈现不仅是基于杂志“创刊宣言”的一种回应,更是编译群秉承先锋性文学想象、时代性文学特征和现代性文学形式的重要实践。

1. 系统译介模式的开展

《小说月报》于1921年、1922年及1930年分别对罗马尼亚的几位代表作家、新晋文豪和几部短篇小说集作了介绍,可以说是国内期刊界译介罗马尼亚文学的重镇。《现代》在几年后重译罗马尼亚文学的出发点则和《小说月报》完全不同。首先,从译者的安排来看,孙用翻译世界语小说已有多年的经验,从1922年开始,他便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译自波兰、保加利亚、爱沙尼亚等多个民族的作家作品。1931年,他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罗马尼亚文学译作《雏》。孙用丰富的翻译经验是《现代》计划重译罗马尼亚文学的重要前提及保障。其次,《现代》主编施蛰存想要通过一部极具心理分析手法的小说向国内读者介绍罗马尼亚具有现代风格的文学类型。此外,关于内心抒发、心理分析、灵魂探索等题材的译作一直为《现代》杂志所青睐。因此,当时由孙用翻译的罗马尼亚小说《小尼克》便进入了《现代》的视野。

紧接着,在译介罗马尼亚文学的下一期,《现代》又向国内读者以全新的角度推出了爱沙尼亚文学。编译者特意挑选了一篇全面介绍该民族文学的文章,从该国的文学发展现状和文学流派出发,重新肯定该民族的文学独立性和创作中的时代元素,从文学的标准出发重新评价了爱沙尼亚“老中青”三代作

家对文学价值的追求和文学形式的创新。除了呈现该国各个阶段和派别的文学发展成果外,编者还专门安排了译者傅平翻译了爱沙尼亚小说《觅珠人》。译者在后记中把作者描绘为一位善于运用写作技巧的小说家和文体家,并从人物塑造、情节构思和创作典型性3个方面帮助读者对小说进行赏鉴。“他的创作的奇想是无边无际的。他引我们走入奇异的世界中,创造许多不平凡的场面,介绍一些不平凡或罕见怪异的人物……在这富有幽默趣味与美妙的奇想的书中,他创造了在爱沙尼亚文学中的如塑的独创的一个典型。”(傅平,874)在这短短几句话中,译者对原作者进行了深入的、聚焦式的介绍,从作家早期的小说创作到当下的创作成果,包括为作家的创作提供灵感与资源的个人冒险经历,以及作品中所呈现的怪诞和奇异的主题元素。除了从爱沙尼亚近期文学创作成果中选译代表作外,译者还亲自撰写了一篇爱沙尼亚的文学概述,与爱沙尼亚本国作者所撰写的文学概述形成对照性、互补性的阅读。施蛰存在编后记中提倡了此种具有系统性的、比较文学眼光的译介模式(编者,1932)。整个系列虽然是以不同的文类进行呈现,但它似乎回避了爱沙尼亚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民族意识、政治现状和民众的思想情况等,转而从作家的创作倾向和风格出发总结该国的文学发展历程。译者在文中只谈文学和创作,这便足以说明他是刻意搁置有关国家民族和政治意识等话题,甚至避免这些外在的因素与文学本身产生勾连。除了翻译文学概论、具体作品以及撰写概述类文章,《现代》杂志还积极地在世界文学通讯类栏目中报道包括爱沙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家在内的文坛动态,时刻关注弱小民族国家生存状态和文学发展情况,与具体的译作形成补充式的译介模式。

2. 对文体改革与创新的关注

在彰显杂志文学立场的创刊号上,施蛰存特意安排刊登了由戴望舒从法文版转译的西班牙作家阿索林(José Martínez Ruiz,又译阿左林)的散文名著《西班牙一小时》。阿索林是印象主义派评论家,20世纪随笔体小说的创始人。施蛰存曾在《编辑座谈》中透露出戴望舒对阿索林散文作品的特殊嗜好与研究。戴望舒曾与徐霞村合译阿索林的《西万提斯的未婚妻》。在为《现代》翻译的同时,戴望舒还将其所转译的阿索林散文发表在另一份文艺杂志《文艺月刊》上。考虑到戴望舒对阿索林文字风格的欣赏,并且有过多翻译经验,编者便在《现代》杂志上力荐了这部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此文是《现代》唯一连

载的译作。这部作品是以史诗的形式来呈现的(编者,1932),不仅有对西班牙社会中各类异端人物的描绘,还有对西班牙文学发展现状的介绍和梳理。《西班牙一小时》本是长篇,戴望舒节译了一部分,他所选译的是那些没有情节结构的随笔。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尽力还原了原作的创作特色即人物的塑造,向国内读者展示了异域社会的众生相。在介绍作家时,译者重点提及了其在文体改革上的贡献。通过对这部散文集的翻译,《现代》杂志为国内读者更新了对散文这个文类的刻板印象,向读者展示了散文体作品也可以拥有广泛的关注点和描写的视角,这使国内读者对该文类所发挥的审美功能有了拓展性的认知。虽然《现代》杂志只是选译了阿索林创作的众多文类中的一种,但这种便是他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旧有文体过程中最重要的成果。编者也欲通过阿索林的散文随笔集呈现给读者他们所认可的“现代”的、具有“文学性”特质的新型文体。无独有偶,《现代》杂志选译西班牙作家巴罗哈(Pío Baroja)的原因也在于作家在文体创新上的贡献。施蛰存充分认可巴罗哈在文学上的成就,称他为“西班牙最伟大、最有世界声名的作家”(施蛰存,262)。巴罗哈为20世纪的西班牙文学语言形式的改革开辟出了一条新的路径,编者认为这一点可以充分地我国的文体创新和改革实践所借鉴。

对阿索林、巴罗哈等作家作品的译介不仅体现了《现代》对弱小民族文学文体改革成果的关注,还承载了杂志编译群对时代文学特征与时俱进的思考。杂志编译群在选译各个文类中所呈现出来的先锋视角推进了国内文坛翻译与创作的同步对应,在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独辟了一处文类审美建构的空间。

3. 创作技巧的聚焦

除了系统的译介模式和对弱小民族文学文体改革成果的关注,《现代》对匈牙利文学作品《钥匙》和作家莫尔那(Franz Molnar)的译介还呈现了杂志编译群对弱小民族文学创作技巧的聚焦与重视。我国对匈牙利文学的翻译其实自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了,1922年《小说月报》上曾经刊载过通讯稿报道欧战与匈牙利文学发展的关系。与其他弱小民族文学不同,匈牙利文学发展的特殊性在于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联。匈牙利的近代历史中有过反抗外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经验,许多社会主义作家在1919年之后从匈牙利逃跑。1920年代初《小说月报》等杂志对匈牙利文学的翻译倾向于凸显那些激励种姓意识、呼唤民族英雄的创作模式,尤其偏重于那些以呼

吁摆脱列强凌辱而独立自强为主题的作品。《现代》所选译的莫尔那被公认为匈牙利现代最伟大的戏剧家,在其戏剧家的身份之外,有过多年革命活动、当过一战战地通讯记者、遭到纳粹疯狂追杀的背景及经历。莫尔那在中国的译介史源于1921年《小说月报》上茅盾撰写的《略匈牙利戏曲家莫尔那的生平及其著作》一文。1922年和1923年,《小说月报》上连续两次刊登了由沈泽民翻译的莫尔那的作品。在面对具有丰富革命背景的作家时,《现代》在译介过程中全然没有提及作家的政治经历,而是尽力凸显该剧本在情景穿插和对话设置两方面的创造性,以及作家本人极富特色的语言风格,强调作品给读者带来的愉快的阅读体验。“佛郎慈·莫尔那是匈牙利现代最大的戏剧家。他底剧本,在穿插和对话这两方面,都极富机智,有轻快的感觉……除了剧本以外,他还写小说及小品,都很成功。尤其是他的对话体小品,是他在文学上最先成功的体裁。”(惜蕙,839)译者从作家擅长的文学体裁、主题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入手,全面地介绍了作家的创作背景和技巧,凸显了莫尔那在剧本中所设置的颇具现代色彩的情节,塑造了其有别于“战地作家”“爱国作家”的“伟大的戏剧家”的形象,充分凸显了其文学上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莫尔那的代表作《钥匙》是由施蛰存亲自翻译的,除了呈现剧本穿插的创作技巧和极具风格的对话体外,译者还关注到了作家在心理描写上的特色。对女主人公紧张心理层层递进的呈现凸显了作者的细腻刻画和译者的生动传递。“我那时实在已经有点张皇失措了……我有点心慌……在使我感觉到长久的沉静之后。”(同上)作品中还有基于主体意象“钥匙”的相关心理想象描述。这些间接而又不断重复的心理描写极富吸引力,使读者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这把钥匙归属者的真实身份。女主人公整个心理变化过程复杂而又多变。译者在选词的时候充分传递了作家独创的话语风格,在穿插和对话两方面衔接自然,尽量保留了作家颇具个人风格的表达方式。

五、结语

现代主义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多民族性,且分布范围很广。(马·布雷德伯里、詹·麦克法兰编、胡家峦等译,1995)不仅是英、法、美等传统的西方国家,在其他国家的创作中也会有现代主义的特征可寻,当然也包括这些以“弱小民族”标签为我国读者所知的文学作品。从翻译立场到翻译实践,《现代》杂志秉持着呈现战后各国文学多样性的初衷,引领

读者去关注这些国家真正的文学发展状况。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完全看不到“弱小”群体的挣扎,也寻不到那些高声呼喊的“矛盾”与“冲突”。在这里,政治化的动机渐渐消退,文学性的导向开始浮现。一直以来,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对中国文学在民族身份确认和文学情感表达等方面承载着特别的功能。《现代》对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超越了被强化和凸显的民族矛盾和国民情怀的书写,缩小了所谓“强势”和“弱势”的概念差异,将这原本在文学层面上不为人所重视的对象纳入了主体探讨的空间,更为全面地揭示了这些民族文学的特征及属性。

参考文献

- [1] 编者. 编辑座谈.《现代》,1932(5): 197—198.
- [2] 陈建华. “时代女性”、历史意识与“革命”小说的开放形式——茅盾早期小说《虹》读解.《左翼文学研究读本》.徐志伟、张永峰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221—246.
- [3] 崔峰. 为“译文”溯源.《中国比较文学》,2009(4): 80—88.
- [4] 傅平. 觅珠人.《现代》,1933(4): 856—874.
- [5]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 [6] 李楠. 动态境遇的报刊文化品格、文学面貌及研究方法——以晚清、民国时期的小报为例.《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5): 47—52.
- [7] 李楠. 海派文学、现代文学的通俗化走向.《文学评论》2008(3): 116—121.
- [8] 李贞玉. 周作人早期译文的翻译策略与性别观念——以《侠女奴》为中心.《励耘学刊》,2013(1): 134—146.
- [9] 刘军. 论建国初期施蛰存独特的文学翻译选择.《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1): 85—90.
- [10] 刘叙一、史婷婷. 聚焦时代的文学性——《现代》译介活动评析.《外语研究》,2020(6): 84—89.
- [11] 鲁迅.《鲁迅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 [12] 鲁迅、周作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评语》.长沙:岳麓书社,1987.
- [13] 马·布雷德伯里、詹·麦克法兰编,胡家峦等译.《现代主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 [14] 沈雁冰. 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背景的缩图.《小说月报》,1921(10): 10—15.
- [15] 沈雁冰. 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小说月报》,1921(12): 106—109.
- [16] 施蛰存.《欧洲诸小国短篇小说集》.上海:正言出版社,1948.
- [17] 施蛰存. 深渊.《现代》,1933(6): 257—262.
- [18] 宋炳辉.《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意识》[D].复旦大学,2003.
- [19] 惜蕙. 钥匙.《现代》,1933(4): 835—839.
- [20] 赵倩倩.《免于偏见的自由——论杜衡短暂的艺术生涯》[D].复旦大学,2011.